

一本初探中国的书 -- 读陈奎先生的长篇小说《古水井》

王德奎

y-tx@163.com

Abstract: 《古水井》以主人公石德贵为主线，以郝兴林为见证人，记录了从 1911 年到 2005 年 94 年间，发生在中国历史变革转型的一些活生生的大事件。首先《古水井》以石德贵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开头，书中标明石德贵 1911 年是 15 岁。他虽是农村里的一个穷孩子，但也能认便条，写简单的家信。以此作为坐标，能把陈奎先生书中列出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记录的石德贵的岁数，换算列出编为年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编年史料书。

[王德奎. 一本初探中国的书—读陈奎先生的长篇小说《古水井》. *Academ Arena* 2016;8(4):88-94].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3. doi:[10.7537/marsaaj08041613](https://doi.org/10.7537/marsaaj08041613).

Keywords: 《古水井》;中国; 历史变革转型; 农村; 史料书

一、《古水井》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讴歌

陈奎先生送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年出版他的《古水井》一书给我时，就说写有 1911 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我一听就喜欢。今年 4 月我从印度旅游考察回来后，抽时间一连几天读完《古水井》，我要为其叫好，因为《古水井》隐藏着陈奎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讴歌。

《古水井》以主人公石德贵为主线，以郝兴林为见证人，记录了从 1911 年到 2005 年 94 年间，发生在中国历史变革转型的一些活生生的大事件。首先《古水井》以石德贵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开头，书中标明石德贵 1911 年是 15 岁。他虽是农村里的一个穷孩子，但也能认便条，写简单的家信。以此作为坐标，能把陈奎先生书中列出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记录的石德贵的岁数，换算列出编为年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编年史料书。

当然书中陈奎先生并没有提到一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为什么我们仍要往这个观念上挂呢？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 年 7 月 18 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邓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把这寓意为“古水井”，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

所以陈奎先生写《古水井》，其中从古井恋情到安家古井，以回归自然结束，从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陈奎先生的《古水井》宣传的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因为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以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为例，他生于 1870 年逝世于 1920 年。1886 年 16 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

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 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 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 年、1896 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 年至 1904 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 20 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 22 亩，每年能收 80 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

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

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

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到一师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校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

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妻子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新思潮的趣事，因此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

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再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人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1919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1919年到1920年间邓绍昌也还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曾参加组织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志，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8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

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张澜先生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没有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后来转入“上海组织”再参加共产党。此后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再后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但在那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1884—1926），生三男二女，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

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1936年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也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其实是1935-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邓小平同志是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二、“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圣洁

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而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比“上海组织”还早一年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正是作为清末川、湘、鄂、粤等省人民进行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压力，卖国丧权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爱国运动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其中因有盐亭范仲纯、范蜀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可以说也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它的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特点，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早最基本特征的体现。

今天来研究保路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同志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等阶层组织、领导干的，和辛亥革命是同个性质的，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实际引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两种版本

的特征看，它是和辛亥革命的性质还有区别。一方面反清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类似民间武装，它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的成员领导参加，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自发参加，这是少量的富人、立宪派、同盟会阶层人物不可比的。其次，发动组织领导这些自发参加的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中，正是还有《重庆报告》说的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的“重庆组织”的人，预先的加入；他们是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工人，分布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的成都、宜宾、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等地；他们还培养熏陶了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奋斗的一批新人。

如新中国诞生的十大元帅朱德（1886-1976）、彭德怀（1898-1974）、林彪（1906-1971）、刘伯承（1892-1986）、贺龙（1896-1969）、陈毅（1901-1972）、罗荣桓（1902-1963）、徐向前（1901-1990）、聂荣臻（1899-1992）、叶剑英（1897-1986）中，有9人都是中国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的川、湘、鄂、粤等四个省中涌现的，并且也是以激烈程度排序出现的。四川四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湖南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湖北一人：林彪。广东一人：叶剑英。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自有它的根基。而且这十大元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也联系紧密。

陈奎先生在长篇小说《古水井》中，塑造了一个参加保路运动的反面人物彭磊，他向清军告密在成都请愿活动中保护过他和战友们的石德贵。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彭磊，1939年已升为副师长的他，带领八千儿女出川抗日，1943年战死在疆场，成为抗战中的战将。石德贵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两次领导过虎狼队，仅1944年到1945年上半年，他的虎狼队十余次进入日军占领的冀中、冀西主要城市，采取不同方式袭击日伪军，使日寇梦想扩大占领区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控制区逐渐缩小。而石德贵最早组建和训练虎狼队，是1920年至1921年他参加川军，在家乡四川的寨子梁山，这是一处典型的干涸盆塞海大围坪地貌。据说四百多年前，明朝军队为了防止张献忠进攻成都，就在这里屯兵、练兵。正是在这半坡的围坪地上，有一口古水井。石德贵和林仙芝的初恋，在军民打水用水的交往中，深深地扎下根，《古水井》全书作为最圣洁的爱情分为多层次来描写。

第一层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重庆谈判期间，石德贵请假第一次回到寨子梁探亲，得知林仙芝为了不受国民党兵痞、流氓的凌辱，跳井自杀。此时古水井已经干枯，围坪古水井两边的

民房成了断垣残壁，所有人去楼空。石德贵回到部队，传来国共合作正式破裂，他参加了横穿冀中，进入华北、华南、华北平原，南下重庆、成都，进军西康，来回转战几千里的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战后他第二次回到寨子梁，带跟他参军的儿子石仁柏到林仙芝的坟前祭拜。他敬佩林仙芝的情和义，敬佩她的坚强和勇敢。

第二层次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石德贵被组织安排到华中一个重点城市担任副市长，分管公安工作。他经历了拒绝比他小20多岁的美丽的中学教师孙雅致的爱情追求，和儿子石仁柏在剿匪中牺牲的痛苦。

第三层次是1957年，61岁的石德贵因在家乡的老岳父、林仙芝的父亲，中风瘫痪不能行动，需要照顾，他向组织申请安排回四川工作，或者退休。省政府批准他退休，由财政拨一笔安置费到老家安家。石德贵第三次回到寨子梁，在这已经荒凉的大围坪安家古井，产生了他与小30多岁的农村妇女桂花，情和义的美丽动人的故事，直到2005年109岁的石德贵去世。陈奎先生为了表达“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圣洁，甚至采用了“魔幻手法”。例如，石德贵为了让已经干涸20多年的古水井能够重新出水，他请年近80岁的打井老人指导。

老人说：地下水也有经脉。水代表着圣洁，可以把肮脏和污秽冲洗掉，因此，它经不起任何污染。这口井干涸的原因，既有你老婆死在井水里，污染了井水，也有外部原因。如半山腰那几棵被砍伐的树，正在龙嘴龙脉上，断了龙的水脉。必须一是对古井进行清淘，二是被砍伐的几棵树，要在原地栽上新树。石德贵请人清淘了井，在靠水井这面山上补栽23棵松树和柏树。井里有了水，又重建了井台和轱辘打水。政府帮助修建的院落，他又用荆棘打造了院墙和水沟。1958年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石德贵虽然巧妙阻止砍伐队对寨子梁正面山林的砍伐，但12月他大哥出工受伤，他回自己原来的老家的三天中，寨子梁山上还是被砍伐了167棵。这里，陈奎先生写的“第27章艰苦岁月”特别动情，他打乱了原先的年谱顺序，把大炼钢铁、反右斗争，自然灾害、大食堂等事件，混合在一起写。而“古水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石德贵把精力一是放在上山刨根补树，二是栽种院子周围、开垦土地上的瓜果蔬菜、红苕和玉米，养好猪。

第四层次是，干旱使山下田坝里的农户，也来寨子梁古水井要水。还有三个衣衫不整的中年妇女到寨子梁石德贵开垦的土地上，饿得手扯着红苕叶一把一把地往嘴喂。村民向田野、山林进军寻找充饥植物，1960年农村妇女桂花出现，就是石德贵64岁时，她带着小孩，手里拿着木碗，跪寨子梁石

德贵院子地上，哀求石德贵给她一口饭吃，孩子饿了整整一天了。石德贵将半碗红苕稀饭倒进桂花的木碗。桂花宁可挨饿，也把半碗稀饭全部让给了孩子，使石德贵产生了敬佩。桂花的丈夫两个月前患病死了，看到石德贵栽种的地不少，一个人忙不过来，请求留下帮他，只要孩子有一口饭吃就行。石德贵和岳父觉得孩子实在可怜，就把桂花母子俩安置留下来。桂花确实是一个能干的农村妇女，她帮石德贵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料理家庭事务也合情合理。1961年荒年已过，饥饿问题得到改善，石德贵想桂花人还年轻，该回去重新组织家庭，就拿钱给桂花，让她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以为她不会再来。但过完年，桂花带着儿子又回到石德贵身边。她说石德贵是她的救命恩人，她要侍候他一辈子。其情与意义可与林仙芝比。

1962年石德贵66岁，说像自己这种年龄的老头，哪天死都不知道，再次劝桂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结婚，才能白头到老。但桂花说自己是结过婚的男人，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愿意为他守寡一辈子。1975年石德贵的岳父、林仙芝的父亲82岁过世。临终前，老岳父对石德贵说：你身体好，活一百岁没问题；桂花是个好女人，希望他最好和桂花结婚。石德贵虽然觉得岳父的话有道理，但退休老人左右不了政治，他怕类似文革的疯狂，只能当个冷静的旁观者。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到1979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石德贵认为是一件好事，再次劝桂花回去争取土地承包的权力。桂花说：“你撵我走，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我的家在这里”。石德贵忙解释：“农村政策好，除交公粮、统购和生产队的提成，土地承包到户说不定还要给你多拿几个”。其实，这反过来却提醒石德贵自己，他20多年在寨子梁山上经常植树，对那片山林付出了心血，如果分给一家或几家社员承包，自己没有管理权，砍伐林木无权干涉，也影响古水井出水，才应该找大队、公社申请承包寨子梁那面山林呢。

三、“古水井”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

陈奎先生以保路运动开头，以寨子梁古水井作引子，初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虽然用的是文学笔法，却把握得十分准确。其道理，也许是绵阳这块土地上的远古文明的遗存，和很多真实的革命历史人物与故事，孕育了这位作家。例如，“第一章逃亡深山”写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成都打伤清兵，逃进家乡深山玉皇庙，被寺庙三住持的云空师傅收留、指教。1914年一个南方来的、跟云空师傅年龄差不多的香客，来到寺庙烧完香后，到云空师傅房间密谈，第二天才走。香客

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寺庙遭黑云山十多个带枪的土匪包围，要寺庙交出南方来的香客和留下的钱财。

又是云空师傅以自己的武功和枪法，制服了这伙土匪。但这之后的第二天，云空师傅给石德贵留下便条，说他已经踏上去南方的路程，那里的事必须他离开。并告诉清政府被推翻，各地都在成立共和政府，要他找准自己的道路，勇敢走下去。这里最大的暗示，是南方来的那个香客，是不是 1914 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派来的？以“云空师傅和尚”作掩护的人，是不是在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前后，已经开始在中国活动组织共产党？因为“第十二章北伐战场”有一个交代，是 1914 年石德贵也离开玉皇庙回家，最终还是参加到熊克武带领的四川国民新军出征重庆、湖北、湖南、广东。1926 年几万人到广东准备北伐时，被国民政府扣押、解散，又被追杀。就是在湖南逃亡的路上被北伐军抓获，在押解的路上石德贵偶然看见骑马行进的一批北伐军官中，有一个是十多年前记忆突然清晰“云空师傅”的人，但他已是北伐军一个参谋长。正是这位“云空师傅”的参谋长安排石德贵到叶挺团长的部队，参加北伐战场的战斗；他的连长是共产党员，跟他特别接近。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叶挺团中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接近者被追捕。这位共产党员连长提前告诉了石德贵消息，并指导石德贵及其朋友到鄂豫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工农武装。由此石德贵经历了张国焘所部的鄂豫皖和川陕红军时期，和红军西征的悲壮，才回延安。以后他顺利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城市建设等事情。这里再看陈奎先生暗写的“云空师傅”，其准确表达，是指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两个“孵抱期”：

一个是众所周知的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传来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

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虽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但十月革命初，苏共派出尼科尔斯基等远东共和国情报部的特工，到中国组织共产党并不成功。此时正是马林才解开的扣。这个荷兰共产主义者被说成是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因是 1913 年 2 月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在爪哇岛三宝垄担任商会的秘书，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马林虽来自宗主国荷兰，却站在印尼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 年 5 月 9 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又创办了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亲自

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连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视马林为眼中钉，1918 年把他驱逐出境。1920 年 5 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1920 年 5 月 23 日由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而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

此时列宁拿马林换苏俄情报特工派到中国指导建党，原因是他有早于十月革命的创建印尼共产党的经验。马林的经验是，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马林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乘坐客轮抵达上海，公开身份是记者。1923 年 1 月 12 日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10 月调离中国。1942 年 4 月 14 日马林壮烈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下。

另一个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的是，19 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入侵，欧洲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南亚组织共产党，给中国传播的原旨原味的马克思主义，马林就是一个代表。

这个坐标还可以选择 1847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到 1871 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实践，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如 1902 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1902 年 10 月 2 日，梁启超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说：“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连孙中山 1912 年 10 月在中国社会党总部，也曾作过“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方法”的长篇演讲。这些内容的刊载，进一步使中国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即使没有列宁、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中国也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有中国共产党。道理也是在中国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以及如直接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重庆组织”的当事人何拔儒、彭健修等，对青少年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有过的直接学校教育和影响。2016 年 4 月 1-12 日我们在印度旅游考察，看到孟买 1887 年完工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比今天我们绵阳的火车站还大，建筑也现代化，可见欧洲资本主

义进入南亚之早和影响之大，由此使人联想到 1895 年清朝发生南方人康有为等发动的公车上书，以及 1898 年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等维新派就有过组建世界联合国的探讨热情，研究中国与英、美、日、俄等大国的关系，也就不觉得奇怪。

再说 1920 年重庆建党，主要力量不但是保路运动的骨干，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支持和参与了的，因为张澜和蒲殿俊也曾帮助过他们。例如，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 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 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 1913 年春赴北京就任，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并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1915 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 年 11 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 年他离川留居北京，把解散的南充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也带到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

其次是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蒲殿俊，1916 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 年 7 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 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 年他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次之职时，这时他的四川老乡、保路运动的老战友张澜和他商量，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推荐蒲殿俊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 Q 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而我们之所以把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1879-1922,原名杨昌济,湖南长沙人),称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杨怀中先生在 1897 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时,就加入南学会的革命派,赞同谭嗣同。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隐居乡间研究和谐大国关系之学。正当他彷徨苦闷时,原先结交的革命党人、好朋友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大国寻找相处之道的感召下,他把杨昌济改名杨怀中,1903 年去日本留学。1909 年又去英国深造,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后来杨怀中把能公开的伦理学教学,暗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大国

关系结合做研究,希望中国避免陷入“鸦片战争”的老路。

这是杨怀中先生学习马克思 1858 年写的在《鸦片贸易史》,看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他反复思量,认为这场名为“鸦片”,实为“贸易”的战争,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走向现代历史的开始。今天来看,可以说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演变的水分岭,也是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水分岭。

而且 1921 年马林能处理好“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的矛盾,马林在给“重庆组织”做工作时,还以“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比较保路运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势力,和辛亥革命的东南同盟会势力的地缘政治、人文生态的不同。众所周知,湖广填四川之所以要移民来“填”,就是因国家内乱,明末清初的 30 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1644 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 月称帝建立政权,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而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就存在上千年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如三星堆、金沙、宝墩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可证。

湖广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所以保路运动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还带有保护本土经济自我发展的愿望强烈,革命态势才发动得如此广泛,而且快。从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到张献忠农民起义兵败四川西盐边境山寨大围坪;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解放;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道路是何等的曲折。依法治国、合作共赢、反对通赢通吃,也许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就已形成的共识,而且后来盆塞海干涸,文明迁徙到世界各方,但在中国先秦古典集大成的文献中,仍对应保留下类似道法自然和大同世界等思想。

而从 1963 年以来我们在绵阳市盐亭县收集到的材料,也可证盐亭人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颀、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参加过“重庆组织”。而且他们在青少年时,也都受过盐亭境内的上古文

明的熏陶，在这类上古文明独特的盐亭存古学堂读过书。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张澜和罗纶，因出生在今西充县，由于有与盐亭接近的地缘，青少年时也受到过盐亭古文明的熏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初出发的基本点，就是要治理中国的“内乱”，甚至是要解决所谓中国历史存在始终无法摆脱的“治乱循环”。这是没有“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的出现，中国也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远古联合国的解散或瓦解，是由于距今 5000 年左右四川盆塞海的干涸。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克服自然灾害一要顺应自然，二也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这是两种智慧：一是人文智力，二是科技智力。而杨怀中、谭嗣同等先进的中国人，对和谐大国关系的研究，也是他们可以

追溯到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

陈奎先生以《古水井》做书名，“古水井”也可以看成“古”到远古巴蜀的堰塞湖、盆塞海。“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看成可以追溯到巴蜀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的大同世界理想。“古水井”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今天也在前进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18 大报告中，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 APEC 北京会议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新型的大国关系，反对通赢通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依法治国等理念和举措的中国梦，等等。

4/25/2016